

# 高擎革命火炬的《向导》

施泳峰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份珍贵的《向导》周报创刊号,纵25.7厘米,横18.5厘米,厚1厘米,是国家一级革命历史文物。虽然纸张早已发黄发脆,但是上面油墨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

## 《向导》周报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如何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计划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但是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的条件不成熟,而且难度太大,建议在上海创办一份周报。最终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建议,决定在上海创办《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老西门肇平路兰发里三号(今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1047弄3号)创刊,由蔡和森担任主编。《向导》周报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为办报宗旨,有8个版面,除报头外其余内容均采用当时报刊通用的竖排版格式,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时事评论”“读者之声”等栏目。《向导》周报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评论国内外时政为主,及时报道和评论时事,以指导现实斗争,系统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阐明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向导》周报在创刊号中科学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指出:“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民主革命,可以说完全是国内的革命,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则不然,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他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封建阶级,一个是外国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占有垄断资本,依附于帝国主义,又与封建势力密切联系,因而反对革命,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是站在被革命的地位”,因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好比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是“革命之绝对的对象”,这一科学论断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相一致。

## 唤醒苦难同胞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深刻的思想性、犀利的战斗性。《向导》周报自创刊之日起,始



## 本報宣言

《向导》周报

终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用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为,指出:“国境以内,租界厘然;水陆要塞,大半割让;各大都会,莫不有外兵的驻扎;长江内河,简直任外舰横冲直撞;海关盐政早已共管,铁路交通又继之;外交内政,无一事能容中国人自主,文化教育也几乎全归外人支配。”《向导》周报通过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激发起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斗志,“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从此深入人心。

《向导》周报自创刊之日起,始终坚持揭露封建军阀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大肆出卖民族利益、出卖国家主权的丑恶嘴脸,以及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比如,1924年皖系军阀卢永祥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江浙战争,《向导》周报发表《军阀战争之一幕》,指出:不管双方“出兵宣言”中如何“词严义正”地大讲“正义与民意”,“这次战争的实质只能是“直与反直的军阀战争”,其结果无非是“外力侵入断送国家生命的惨痛都是有加无已”,但是“在这一幕大凶剧之中,江浙人民所身受奸淫掳掠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痛苦,岂是十年廿载所能恢复?”《向导》周报通过不断地揭露封建军阀的反动本性,激发起中国人民反抗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革命斗志,“打倒军阀”成为北伐战争的重要口号。

《向导》周报自创刊之日起,始终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积极开展工农运动,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

主张,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广东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为此,《向导》周报发表《统一的国民运动》,指出:要打倒军阀,“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工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特别有指导中国国民革命之资格”,“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国民革命是中国目前所紧急所可能的工作,只有国民运动能打倒军阀,开辟我们共产运动的途径”。

## 强大的编辑和作者队伍

《向导》周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很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如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向警予、赵世炎、罗亦农、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王若飞等,他们的理论修养较高,斗争经验丰富,既具有忠诚的信仰追求、深厚的大众情怀,又有深刻的社会观察力、科学的思辨能力与论述水平,他们编辑与撰写的文章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并以大众化、通俗化的表达形式广泛流传开来。

比如,《向导》周报的首任主编蔡和森留学法国时就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人道报》等百余种马克思主义书报,打下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蔡和森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的现状和未来,以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和善于工作的办报作风,为后人树立光辉的榜样。

蔡和森在担任《向导》周报主编期间,单独署名的文章有130多篇,联合署名的文章有36篇,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对我国的殖民主义侵略罪行、揭露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宣传国共合作、论述工农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以及介绍苏俄、土耳其、匈牙利等国外革命的情况。虽然蔡和森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身体瘦弱,但他仍然整天在屋子里埋头写作和编辑,往往记不起吃饭,有时晚上写作疲倦了,常常不解衣不脱鞋,倒在床上躺一会儿,又爬起来继续工作。

## “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向导》周报在1922年的发行量为1000多份,以后逐渐增加,在1923年增加到5000多份,到1926年已经达到3万多份,还出版了50期为一集的合订本。随着社会影响的持续加强与国内读者的拥护支持,《向导》周报从最初在上海、北京、广州、长沙等4个城市发行,发展到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发行,甚至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也有发行。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中国的日刊与周刊,你最爱看哪种”的民意测验中,在被调查的1007人中,《向导》周报获得224票,名列全国周刊榜首。

《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后,由于反动军阀的破坏、阻挠与镇压,发行到第5期就遭到查禁,《向导》周报编辑部不得不于1922年10月从上海迁往北京,在北京西城区中老胡同1号(今北京市东城区中老胡同1号)出版发行《向导》周报第6期到第20期。“二七惨案”发生后,《向导》周报编辑部不得不于1923年3月从北京迁往广州,在广州昌兴街28号(今广州市越秀区昌兴街28号)出版发行《向导》周报第21期到第85期。由于国民党右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向导》周报编辑部不得不于1924年10月从广州迁往上海,从第86期起《向导》周报一直在上海出版发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导》周报编辑部不得不于1927年4月从上海迁往武汉,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向导》周报被迫于1927年7月18日停刊。

《向导》周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前后历时近5年,先后辗转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出版发行201期,发表文章1400多篇,累计300多万字。《向导》周报始终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路线、方针为己任,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热情宣传和支农支工革命运动。《向导》周报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破裂、大革命兴起与失败的全部过程,犹如“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唤醒了四万万踏在国内外强盗脚下的苦难同胞”,“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为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前行的方向,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发行的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发行时间最长且连续出版的刊物。

(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政协委员)

座,对于了解红山文化的内涵与年代具有重要作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现并复原了一尊红山文化晚期的整身陶人,通高55厘米,头部戴冠,神态逼真,表情丰富,在全国同时期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见。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总面积达150万平方米,为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也是目前除朝阳牛河梁遗址外,发现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遗址,奠定了赤峰地区在红山文化玉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此次论坛主要讨论了红山文化系列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讨论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比较研究,推进赤峰红山后、魏家窝铺、朝阳牛河梁遗址群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及相关事宜;以及推动红山区文旅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此次论坛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红山文化考古发掘、阐释、保护、传播及申遗工作,了解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其意义和价值的更深层次发掘与阐释,对于当今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 遗世独立贡院碑

李军涛 本报记者 王有强



贡院碑照片

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中轴线西侧,两座古朴典雅的四角攒尖顶碑亭坐落于此,亭中各矗立一通高大厚重的石碑。石碑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贡院碑。

两座碑石一先一后建起,先立的是《改建河南贡院碑记》,该碑石立于1732年,碑文由时任河南巡抚田文镜所撰写;后立的是立于1844年的《重修河南贡院碑记》,碑文由时任河南巡抚牛鉴撰写。《重修河南贡院碑记》的碑座图案,前面是小的二龙图,后面是大的单龙头。两石碑形制相同,碑帽前后是腾跃于巨浪之上的双龙石雕,方形碑座的四个侧面有腾龙浮雕,楷书碑文字体工整秀丽,堪称书法佳作。碑文虽经近几百年风吹日晒,仍无大缺损。

河南贡院曾承办1903年、1904年的全国会试,原因有三:一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北京顺天贡院被毁,河南贡院地处中原,规模大,保存好,可举办会试;二是《辛丑条约》规定和团运动波及的五省四十六道府州县停办科举5年,河南开封正好不在其列;三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宫回銮”途中曾抵达开封。故而此二年的两次会试得以由河南贡院举办。1903年2月、1904年3月全国会试在河南贡院举行之后,历经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于此画上了句号。

贡院碑石印刻斑驳,记载着自身的变迁,而那些曾在贡院内怀着一腔热血参与考试、希冀着金榜题名、飞黄腾达的普通士子也随着这斑驳的碑刻一并模糊了。

两通贡院碑虽说历史悠久,意义深远,但由于时局变迁,战火连绵,百余年间早已被肢体分家、横躺在

地,埋于草丛之中。据河南大学文学院一位教授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后,师生们修整校园,将其从乱草中抬出,置于路边作为石凳,方便师生休息和学习之用。”1963年,双碑又被竖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修建贡院碑亭。同年12月23日,贡院碑被开封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开封市文物保护单位”。

1912年,以林伯襄为代表的一批河南仁人先贤,在欧风美雨和辛亥革命胜利的曙光中创办了河南留法预备学校,始建于河南贡院旧址(明伦校区所在地),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后历经中州大学、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省立河南大学等阶段,1942年升格为国立河南大学,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医、法等6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学术实力雄厚、享誉国内外的大学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院系调整,校本部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后又经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等阶段,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此间几多发展变化,贡院碑都同河南大学、同河南大学代师生们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在断壁残垣中新生、于时代新声中复兴,跟随着国家发展的脉动向前展望、迈向未来。这两通矗立于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内的贡院碑,它们以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其价值在于记载的史料,在于光阴流转的见证,在于无尽的守望与静默的等待,在于“居高位立威名,处俗世静候而不惊”的自得。

在风雨兼程、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贡院碑石矗立在这中原大地、汴梁古都,目送莘莘学子来去,以长者的口吻吟唱无声的历史颂歌,在无数个昼夜交替、四季轮换中,守望着河南大学的光明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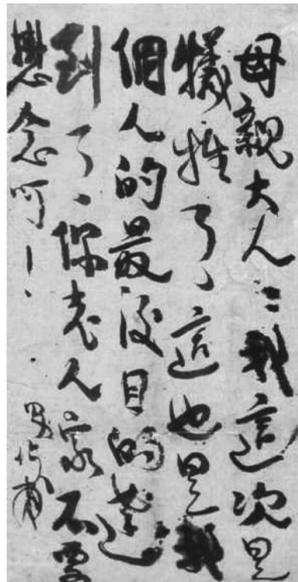
# 周介甫致母亲的“绝笔书”

宝藏  
BAOCANGWUYU

井冈西麓,罗霄深处,往日的鄱县,今天的炎陵,曾经有一位共产党员,叫做周介甫。在狱中,他写下一封致母亲的绝笔书后,即被杀害,时年25岁。

在这封绝笔书里,他写道:

母亲大人:我这次是牺牲了,这也是我个人的最后目的达到了,你老人家不要挂念呵!男 介甫



周介甫致母亲的绝笔书

1903年10月,周介甫出生在“八分半山一分田”的鄱县,1926年,周介甫回乡,办起农民夜校,在他的带领下,青年农民到校学习,接触先进思想,成立了最早的鄱县农民协会,周介甫被选为该协会委员长。1927年11月,周介甫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在3000余人聚集的一场军民诉苦大会上,这位共产党员毅然烧掉了自家的山林地契,将所有土地、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以一把火,表明了革命的决心。

1928年4月下旬,地主反动势力反扑,为了保卫苏区,周介甫广泛发动群众,组建了农民游击队,开展斗争。周介甫在指挥游击队分路突围中,不幸被捕。在监狱,周介甫遭到严刑拷打,慷慨赴义。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览中,除周介甫这封致母亲的绝笔书外,还有他的一幅“为主义而牺牲,虽九死犹无悔”的题字展出。二者接续展示,如同周介甫面对母亲的陈情,令人动容。

# 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召开

聚焦“比较视野下的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探索”

本报讯(记者 付裕)2022年度红山文化高峰论坛日前在内蒙古赤峰市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红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论坛主题为“比较视野下的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探索”,推动红山文化考古发掘、研究、保护、传播和申遗工作。此次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遗址之一,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北亚地区同期或稍晚阶段的史前文化曾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30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到赤峰、林西开展考古调查,发现多处红山文化遗存,揭开了赤峰地区史前考古的序幕。1954年,尹达先生根据梁思永先生的建议,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与小凌河流域,历时1500余年,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在距今5500~5000年的晚期阶段,红山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期,遗址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加,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加剧,以建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集中出现;等级制度逐渐确立,聚落内部出现高等级社区,以玉为葬、以玉为礼的礼俗开始出现,突出强调玉器的重要地位,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最终确立;

同时,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成为红山文化先民的共同信仰;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社会的高度发展;科学和艺术成就超越以往,以天文学知识的科学积累和玉雕技术的空前发展最具代表性。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统计结果显示,赤峰境内现存红山文化时期遗址725处,是红山文化分布区内遗址最密集、最集中的地区,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是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也是中华龙的故乡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赤峰市红山区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经科学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共清理房址110余